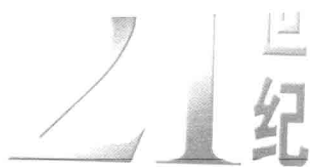


21世纪

中国文学大系 2010年翻译文学

21SHIJIZHONGGUOWENXUEDAXI
2010NIANFANYIWENXUE

◇主编/韩忠良◇本卷主编/谢天振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中国文学大系
2010年翻译文学

ZHONGGUOWENXUEDAXI
2010NIANFANYIWENXUE

◇主编/韩忠良◇本卷主编/谢天振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 谢天振 201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10 年翻译文学 / 谢天振主编.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1.5

(21 世纪中国文学大系 / 韩忠良主编)

ISBN 978-7-5313-3955-7

I. ①2… II. ①谢…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世界—现代 IV. ①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52355 号

2010 年翻译文学

责任编辑 常 晶 郝庆春

责任校对 范丽颖

封面设计 冯少玲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幅面尺寸 145mm×210mm

字 数 420 千字

印 张 14.375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 编 110003

网 址 www.chinachunfeng.net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 刷 沈阳市新友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313-3955-7

定价: 28.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029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24-88517857

序

谢天振

回眸 2010 年中国翻译文学，我觉得有两件大事必须一提：一是三年一度的鲁迅文学奖评奖优秀翻译文学奖空缺，另一则是一年一度的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对前者我一直持较多保留意见，对后者我是有贬有褒，譬如对去年的诺奖颁奖结果我颇有些微词，但对今年的结果却是赞赏有加。

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是于 2010 年 11 月 9 日正式颁奖的，但之前在先行颁布本届的评奖结果时，文学翻译的空缺就已经引发了学界和译界的热议和质疑。对此有关评委的解释是，尽管“中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在近一二十年间的的发展，其成就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然而在表面的热闹之下，能感动读者、令人信服的文学佳译却似乎不多，粗制滥译的反倒并不少见，很多译本禁不住显微镜观察，甚至硬伤累累。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空缺，实际上是一种必然”。

我对这种解释颇不以为然。我当然也赞成在评选鲁奖优秀翻译文学奖时要考虑译作的翻译质量，对那些翻译质量“硬伤累累”的译作不能入选鲁奖，我也认为是完全应该的。然而现在的

问题是，除了译作的翻译质量，鲁奖的评委们是否还考虑过其他因素？本届鲁奖曾有五部译作取得了备选资格，但最终还是无一获奖，有关负责人解释说其原因是这“五部备选作品都没有达到获奖标准”。鲁奖优秀翻译文学奖的获奖标准具体包括哪些内容，我们不得而知，但从有关评委屡屡提及的关于备选作品“翻译疏漏层出不穷”、“翻译表达不贴切、不准确”等意见来看，我们不难想见，评委们关注的主要也就是译作的翻译质量，最多还有编辑质量罢了。

然而，在评选代表一个国家最高级别的优秀翻译文学奖时把眼光仅仅或主要集中在译作的翻译质量以及编辑质量上——具体而言也即其语言文字转换是否贴切、是否准确等，是不是就够了呢？假设有一部译作，它的翻译质量达到了评委们的要求，表达贴切、准确，也没有累累“硬伤”，这样的译作是否就可以获得鲁奖优秀翻译文学奖了呢？若是，那么这样的评奖无疑是把一项崇高的国家级别的优秀翻译文学评奖降格成了一桩普通的文学翻译竞赛的评奖了（文学翻译竞赛的评奖才是把翻译的质量放在首位而不顾及其他因素的）。

而鲁奖评选的是优秀翻译文学。何谓优秀翻译文学？众所周知，文学翻译承担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向译入语国家的读者译介在古今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家及其作品。因此，评判一部译作是否称得上是优秀的翻译文学作品，首先我们应该看它所译介的原作是否属于优秀的文学作品之列。否则，如果原作是一部在世界上属于二、三流的作品，甚至是文学垃圾，那么这部译作的质量再高，它也没有资格入选像鲁迅文学奖这样的国家级别的奖项。

其次，评判一部译作是否属于优秀的翻译文学作品之列，还应该看它是否对译入语国家的文学、文化做出了贡献。譬如上世纪80年代以来译介入我国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等作品，对刷新我国读者对世界文学的认识、对启迪我国作家的

创作理念等，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们的作家在读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等作品后发出感叹：“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我以为像这样的译作就应该称做优秀的翻译文学作品。而假如一部译作尽管翻译质量也还不错，出版后也广受读者欢迎，发行量还很大，那至多也就是一部畅销书而已，而绝对不够优秀翻译文学的资格。

最后，优秀的翻译文学作品当然还应有较高的翻译质量。但这里的质量不应该只是指译文在对原作的语言文字转换层面上毫无瑕疵，还应该指译作能不能给译文读者以原作读者同样的美的享受，同样的心灵感动，同样的思想启迪，或如草婴先生所言，让读者在读译作时能“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历其境”。换言之，作为一部文学作品，译作应该像原作一样，营造起一个优美、生动、丰富、充满魅力的文学世界，这样的译作才称得上是优秀的翻译文学。

优秀的翻译文学作品当然不应该有“累累硬伤”，但我也反对把译作放在“显微镜”下观察。这种做法不是在评优秀翻译文学奖，而是外语教师在批改学生的翻译作业。对于偌大一部译作来说，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言，“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尽贴合原文”。因此，译作中存在的一些翻译瑕疵不应成为其能否获奖的主要考虑因素。

本届鲁奖文学翻译的空缺还造成了一个假象，似乎目前我们国家已经没有了优秀的翻译文学家，已经没有了优秀的翻译文学作品。这对目前仍然健在的优秀翻译文学家来说显然是不公正的，同时也不符合目前我们国家文学翻译的现状。我当然承认目前市场上粗制滥译的翻译作品是不少，它们败坏了我们国家文学翻译的声誉，但是它们不是我国目前文学翻译的代表，代表我国目前文学翻译水平和成就的，应该是草婴、杨绛、李文俊、杨武能、赵德明等一批真正优秀的翻译文学家。

我们的评委一方面对着翻译质量“硬伤累累”的备选译作慨

叹“目前能感动读者、令人信服的文学佳译却似乎不多”，但在另一方面却对众所公认的翻译大家及其优秀译作视而不见；一方面强调“文学翻译应是一门精致的艺术”，应“给予足够翻译时间，慢工出细活儿”（本届评委主任蓝仁哲教授语），但另一方面却又急功近利地把目光囿于最近三年出版的翻译作品。正是由于这种过于功利的评奖标准和方法，凝聚着著名翻译家草婴先生毕生精力和心血的煌煌十二卷的《托尔斯泰小说集》、李文俊先生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精心翻译的福克纳作品等，也就无缘鲁奖优秀翻译文学奖了。这对鲁迅文学奖实在是一个讽刺，同时也是鲁奖优秀翻译文学奖迄今在广大读者心目中缺乏权威性的原因所在。

作为我们国家最高级别的优秀翻译文学奖——鲁迅文学奖，本来它理应担当起一个正确的导向作用，也即通过评奖展示我国现阶段真正优秀的翻译文学作品，通过评奖引导我国广大翻译工作者向草婴先生等这样一批终生不渝、献身崇高的文学翻译事业的杰出翻译家学习。但是由于目前这种过于功利的评奖标准和方法，一批优秀的翻译文学家及其译作被排斥在评奖的范围之外。

由此可见，文学翻译之所以空缺本届鲁奖，与其说是因为我国目前文学翻译界缺乏优秀的翻译作品，不如说目前的鲁奖优秀翻译文学奖的评奖理念、机制、方法和标准等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

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结果显然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之前媒体和公众都普遍预测今年该轮到诗人来领奖了，譬如赢得许多中国读者喜爱的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就是众望所归的人选之一，我们2009年推出的“翻译文学卷”就选入多首阿多尼斯的诗，然而最终评委揭晓的得主却是秘鲁小说家巴尔加斯·略萨。

尽管结果出乎预料，但在第一时间获悉略萨得奖的消息后我却由衷地为之感到欣喜，不是为略萨，而是为诺奖评委所做出的明智的选择。因为把诺奖颁发给略萨这样一个在我看来是真正的、纯粹的文学家，给诺奖注入了明确的文学因素，多少表明了

一个文学奖项对文学的回归。如果说2009年把诺奖颁发给德籍罗马尼亚裔作家赫尔塔·米勒带有明显的政治印记的话，那么选择略萨作为2010年的诺奖得主其政治因素显然大大淡化了。

我对略萨毫无研究，对略萨的作品读过的也不多，但他的一部长篇《天堂在另外那个街角》和一篇散文《文学与人生》（均赵德明译）却足以让我认识略萨卓越的文学才华和他对文学的真知灼见和深刻情怀。

我至今都难以忘怀初读略萨的长篇小说《天堂在另外那个街角》时所感受到的强烈震撼。还在六年前，当我照例在翻检浏览当年发表出版的翻译文学作品以编辑“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4年翻译文学卷”时，我读到了略萨的《天堂在另外那个街角》，立即为之震慑，当即决定把这部长篇小说（片段）作为这一年度的《翻译文学卷》的镇卷之作。但紧接着我又读到了略萨的散文《文学与人生》，同样立即被之征服。这让我起先稍稍有点犹豫，因为在同一本翻译文学卷里收入同一作家的两篇作品，在此前编选的三本翻译文学卷里还从未有过。事实上，在此之后我编选出版的五本年度《翻译文学卷》里也没有再出现过。不过我当时很快就决定要为略萨破例，因为这篇散文激起了我太多强烈的共鸣，与此同时我也太迫切地想让更多的读者与我一起分享略萨散文中无比丰富而又深刻的思想了。

略萨的《文学与人生》是一篇雄辩滔滔的论说文，它触及了当前社会的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在科技越来越发达、商品经济的大潮汹涌而来几乎占据了现代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的今天，人们尤其是年轻人越来越多地依赖和沉迷于视听媒体，文学（它的载体就是书籍）会不会消失？未来的人类真的会像比尔·盖茨所预言的那样将只从屏幕上阅读了吗？略萨的文章极富说服力地分析了（书面）文学的种种不可替代的功能——培养公民的批评精神、独立思考精神、永远斗志昂扬的精神以及丰富的想象力，等等。他更进一步分析了一个没有文学的世界将是怎样一个没有教

养的世界、野蛮的世界、缺乏感情的世界、无知愚昧的世界、没有激情和爱情的世界，最后明确指出视听媒体无法代替文学的种种功能。

在纯文学作品正越来越被边缘化的今天，在整个社会尤其是我们的年轻人正变得越来越浮躁、越来越焦灼的今天，让我们静下心来听一听略萨以上的这些声音当不无裨益。而假如略萨的获奖能把我们的目光再次投向真正的、纯粹的文学，能让我们的文学真正担当起它那种种不可替代的功能，能让我们的作家和诗人为我们的读者奉献出更多充满美好爱情、崇高激情的文学世界，那么 2010 年诺奖评委所做出的选择将功莫大焉！

浏览检阅 2010 年国内发表出版的翻译文学作品，不出所料，2009 年的诺奖得主赫塔·米勒立即成为 2010 年文学翻译的热点，南北两家主要的翻译文学期刊《外国文艺》和《世界文学》不约而同地都推出了米勒的专辑。《外国文艺》选译了十四篇米勒的短篇作品。另外，除配发了一篇全面介绍米勒的文学成长经历的刊头文章《低地到高峰——赫塔·米勒的文学之路》外，还特地翻译了两篇国外发表的关于米勒的文字——俄罗斯作家别洛鲁谢茨的《我关于自己的回忆》和罗马尼亚广播电台《文化世界》栏目播报的《与赫塔·米勒共同度过一个夜晚》。《世界文学》的“米勒作品小辑”则推出了米勒的一篇中篇小说《人是世间一只大野鸡》、三篇散文和一篇她在诺贝尔颁奖典礼上的获奖词——《每个词都知道某种魔圈》。

我其实很想挑选一篇米勒的小说编入我们这本“翻译文学卷”，但最终只选了她的一篇获奖词。我觉得这篇获奖词同样体现了米勒作品一贯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和强烈的自传性，同时还让读者感受到了文学作品特有的温馨。作者少年时代母亲每天早晨在她出门之前简简单单的一句提醒问话“带手绢了吗？”引发出她对当年在罗马尼亚专制时代所遭受的迫害的回忆，引发出她的朋友、罗裔德国诗人帕斯提奥在苏联劳动营的痛苦经历，引发出

她祖父母一个狂热的纳粹儿子丧失理智、阵亡前线的令人震撼的故事。而米勒把这一切又与她的写作联系了起来：“我只能在头脑中，在写作时的词语魔圈中，默默地写下发生的事情。……我在词语的魔圈中追逐所体验的事物，一直到我找到我以前不曾认识的东西。”

这样，在选择2010年发表的翻译小说时，我把目光首先投向了另一位诺奖得主——2006年的诺奖得主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远亲》（《外国文艺》第1期）和著名加拿大女作家门罗的《熊从山那边来》（《世界文学》第1期）。

《远亲》其实是帕慕克的第一部用母语创作的长篇小说《纯真博物馆》的节选。然而，尽管只是十余页的节译，但也足以让读者领略到帕慕克小说中所生动呈现的伊斯坦布尔的异域风情，让读者感受到帕慕克笔下细腻描绘的对逝去爱情的惆怅和深切怀念。

艾丽丝·门罗是我非常看好的一位当代加拿大女作家，她的短篇小说尤为出色，甚至被誉为“我们时代的契诃夫”。近作《熊从山那边来》秉承其一贯的写作特点和风格，文笔细腻生动，貌似波澜不惊、平淡无奇的故事，却自有一股摄人灵魂的震撼力。小说叙述的是一对老年人的故事：女主人公菲奥娜患有老年痴呆症，男主人公格兰特只得把她送入老人院。格兰特不能忘怀多年来对菲奥娜的一往情深，每星期都是好几次地前往老人院看望菲奥娜，带去鲜花和食品。但菲奥娜已经不认识格兰特了，她与老人院里的新朋友们一起打桥牌，显得很开心，还与他们很亲密。此情此景，自然让格兰特倍感苦涩和伤心，但他仍对菲奥娜不离不弃，不时地回忆往昔与菲奥娜一起度过的美好日子，还抵制住了来自其他异性的诱惑。小说结尾时菲奥娜似乎有点“醒”了，她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拉拉格兰特的耳垂，对他说：“我见到你真高兴。”接着又说，“你是可以开车跑掉的，开车一走了之，在这个世界无牵无挂，将我抛弃。抛弃掉我。把我给抛弃了。”这时格兰特“把脸埋在她的白发里，紧挨着她粉红色的头

皮，她那模样小巧可爱的头颅。他说，绝不会有这样的可能的”。据说这篇感人至深的小说已经被改编成电影，还入围了奥斯卡奖。英文片名为《Away From Her》，台港电影界把它译为《柳暗花明》，我觉得似未能曲传其妙。

李翊云的短篇《独自一人》（《外国文艺》第2期）和李立扬的诗（《译林》第3期）让我们注意到活跃在异国他乡文坛的一群海外华裔作家和诗人，如严歌岑、哈金、虹影、林湄等。作为一名“七〇”后美籍华裔作家，李翊云的“创作关注人生的残缺，以个人生活描述为主，多为非常态的人生轨迹”，“很能打动读者”。这篇《独自一人》同样“体现了作者高超的短篇小说技巧，在历时性叙述的框架内，通过内心独白、插叙、意识流等手法，将主人公苏晨的创伤记忆、回忆、当下处境与现实场景，巧妙、有机地糅合在一起，增强了小说的悬念，促使读者探寻主人公创伤的原因，从而引发对人性的思考”（引自查明建《多元文化语境中的离散写作》）。小说中丈夫安排女主人公苏晨移民美国，希望她能“在一个新的国家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婚姻、友谊、孩子”，让她彻底忘掉少年时的那场悲剧——与六个女同学一起溺水，唯独她幸存下来，从而一直忍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但是尽管事件已经过去了二十九年，苏晨还是无法摆脱内心的阴影，而且还越来越沉重，最终她还是选择了离婚，并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

与李翊云的小说不同，李立扬的诗，无论是它们的节奏还是意象，甚至内容，都会让国内读者感到一种突兀、奇特的现代元素，感到一种来自大洋彼岸的文化间距。尽管如此，但当我们读着“我不能永久。记忆甜美。甚至当它是痛苦的，记忆仍然甜美”等诗句时，它们还是能引起我们的共鸣。

和大多数读者一样，在读小说时，我总希望能读到人物形象生动、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字里行间充溢着人间真情的作品。为此，我针对国内外文坛过于热衷各种“主义”的实验，还写过一

篇短文《回归故事，回归情节》，呼吁作家为读者提供更“好看”的作品。2010年国内发表的翻译文学中我发现有两篇这样的作品：美国作家理查德·耶茨的《恋爱中的骗子》（《外国文艺》第3期）和韩国作家李红的《时装密码》（《世界文学》第5期）。

耶茨的小说《恋爱中的骗子》其标题似乎对读者会有一种误导，因为标题中“恋爱”两个字让我误以为男女主人公是一对情侣，在谈恋爱，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这里小说的标题翻译恐怕有点问题。小说讲述的是一对青年夫妇在结婚两年多后，婚姻关系中出现了一点问题：依靠富布赖特奖学金的资助，男主人公马修斯带着他的妻子卡罗尔和两岁大的女儿凯西从美国一起来到伦敦暂住，从事某个项目的研究。但卡罗尔来英国后没多久就发现自己讨厌伦敦，觉得“这里又大又乏味，而且没有人情味”。两人的关系不融洽已经有一段日子了，本来他们可能都曾希望能通过搬到伦敦来改变一下环境也许能把事情理顺，但是到伦敦后情况未能如愿。两人并没有吵架，对他们来说“吵架属于他们结婚后更早的一个阶段”，现在他们就是觉得“不喜欢跟对方在一起”。他们居住在所租住的收拾得井井有条的小小地下室房间里，但老是觉得几乎好像干什么都会影响到对方。“哦，对不起。”每次他们笨拙地撞到一起或者挤到一块时，都会咕哝着向对方这样说“对不起……”终于有一天，卡罗尔对马修斯表示要带女儿回美国去，马修斯很爽快地同意了，并没有加以挽留。

可是在卡罗尔离去后，马修斯感觉到了孤独和寂寞。他到酒吧试图结识新朋友，但显然并不容易。他到了红灯区，认识了一个名叫克利斯汀的妓女。他与克利斯汀、与她的女伴、她的邻居等人交往了一段日子，却并没有得到生理和精神上的满足，他开始怀念与卡罗尔在一起的日子了。与此同时，回到美国后的卡罗尔几乎每星期都会给他寄来一封语气温和的信。信上说她爱他，很想念他，想让他回家。在信中卡罗尔也在反省自己：“……回想起以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知道问题更多出在我身上，而不

是在你身上。我经常错误地把你的温柔当成软弱——那肯定是我所犯过的最糟糕的错误，想到这就让我感觉痛苦至极，可是还有很多别的……”小说的结尾，马修斯收拾好行李回国了。原来这个小说标题中的“骗子”不是别的，而是这对年轻人婚后因彼此间缺乏经常的沟通和交流而产生的误解、迷惘、失落和虚诞。

读罢《时装密码》，让人不能不对李红这位韩国“七〇”后女作家的高超叙事技巧击节赞叹。小说的主角是一对母女，母亲因爱情缺失，于是通过疯狂购买高档时装来填补自己生活的空虚，掩盖某种不幸的以往。女儿似乎也继承了母亲的秉性，对奢侈品牌时装的追逐比起她母亲来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实际上，在母女俩那一套套华丽时装的背后，却隐藏着令人震惊的秘密。小说故事情节显得扑朔迷离，犹如一组难解的密码。然而如果细细辨析，就能发现貌似一团乱麻的情节，无论如何曲折变化，其实作者都已事先埋下了伏笔。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用细腻的笔触，深刻揭示了当代韩国青年一代在享受富裕的物质生活时，却难掩其精神的空虚。小说还极其巧妙地运用当代世界著名时装的品牌名，诸如“香奈尔两件套”、“真实信仰牛仔裤”、“华伦天奴晚礼服”，作为小说中的一个个小标题，既与作品的内容相互呼应，贴切融合，同时又贯串起了整篇故事的情节，从而带给读者一种相当新奇的阅读感受。

如果说，韩国作家的作品带给读者的是一种新奇的阅读感受的话，那么发表在2010年《世界文学》上的两组当代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带给读者的就是颠覆性的震撼了。传统俄罗斯文学中崇高的人物形象，美好的理想追求，深刻的道德反省，等等，在这里已经荡然无存。当代俄罗斯文学的一些作品开始逐步远离严肃的社会主题，表现出“淡化情节、躲避崇高、寻求自我”的特点。作为俄罗斯“新自白小说”代表的德米特里·巴基恩的《树之子》（《世界文学》第3期）即是一例。小说以一个残疾儿一家的生活经历为主线，展示的生活是委琐、平庸的，描写的人物

或是身体有缺陷的，或是心灵受过创伤的，人物的行为是不合逻辑的。这里没有生动的故事，曲折的情节，但是通过作者大量使用的隐喻、象征等手法，读者可以体味到作者对人性的深入探究。

另一位当代俄罗斯作家维·叶罗菲耶夫的小说《和白痴一起生活》（《世界文学》第4期）与之相仿，恰似其主编的代表俄罗斯新文学的文集《俄罗斯的恶之花》，标榜“对俄罗斯经典文学的反叛”，宣扬“恶的诗学、暴力的诗学、病态的诗学”，“彻底消解了人道主义和人性的传统观念，以对人性的丑恶残酷、变态肮脏的极端展示消解了人们对于真善美的阅读期待”。

小说的故事极其荒诞：男主人公是个文学家，不知什么原因，必须接受惩罚，惩罚的方式是他必须到白痴收容院里去领一个白痴回家与自己一起住。起先白痴沃瓦显得很谦恭，经常做一副沉思状，男主人公还认为他以前一定是位教授。但后来有一天，男主人公回家发现沃瓦坐在厨房地板上的一大摊牛奶里，周围堆满了从冰箱里拿出的食物。再后来，他在房子中央拉了一大泡屎，把粪便抹在墙纸上，往冰箱里小便，用刀子割地板和家具。再后来，沃瓦砸坏了电话，他们与外界的联系中断了，男主人公与他的妻子被封锁在第二套间，妻子开始没完没了地埋怨，夫妻俩的关系变得敌对起来。夜里，沃瓦猛烈地敲打他们的房门并大声号叫。男主人公拉开房门想去教训教训他，不料被沃瓦一把就拖出了卧室，沃瓦进入了卧室并反锁上了房门。随即男主人公听见房间里传来两个人声嘶力竭的号叫声，沃瓦和他妻子的号叫声。从此，“生活似乎走上了正常的轨道”，“沃瓦变得爱干净多了，基本不在地板上大小便了”，而男主人公则开始在沃瓦的沙发床上睡觉。看见妻子一副幸福的样子，男主人公提醒她“和白痴一起生活充满了意外”，但妻子反而骂他：“你才是白痴！是你！你的嘲讽，你的狐朋狗友，你的冷酷和傲慢，这都是白痴的表现。他比你纯洁得多，高尚得多！我和他在一起才感觉到自己是个女人，是个母亲。我想给他生个孩子！我爱他。我

要生下这个孩子。”

故事的结尾更是荒诞：男主人公的妻子在怀孕后做了人流，沃瓦与她反目成仇，并与男主人公一起住进了相邻的房间，相亲相爱。最后，他还把这个妻子杀了，扛着她的尸体永远地消失了。

对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的焦虑，对人与环境如何和谐相处问题的探索，等等，是当前被称为“日本环境文学”的作品关注的焦点。日本作家阿部昭的小说《自行车》（《世界文学》第2期）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故事和情节：男主人公住家的附近有一块空地成了“大件垃圾”的堆放站，许多自行车被扔在那里，“从接近报废的到几乎全新的，从成人使用的到儿童专用的，各种款式和型号的应有尽有”。不光是自行车，普通家庭日常使用的各种家具器皿，“从锅碗瓢盆到冰箱、煤气灶，从厨盆、浴缸到洗脸盆、洗衣机，还有餐桌餐椅、成套的客厅沙发，甚至挂钟、电视、梳妆台、旅行箱，各类物品一应俱全”。看着这些所谓的垃圾越堆越高，看着有些甚至大老远地开着小型卡车把立体声音响、大衣柜等物件扔到这里，男主人公心里“有点不舒服”，因为这些“大件垃圾”比起他家“那些小心使用的可怜的家具用品来，大多都要好很多倍”。他经常到这里来散步，实际上是想在这里给他的第三个孩子找一辆成色比较新的儿童用自行车。这天白天他发现了一辆这样的自行车，但碍于面子没有下手，打算待晚上天色暗了后与家人一起去取。然而晚上的大件垃圾堆放站却是热闹非凡，有好多人的手电在那里寻找各自感兴趣的东西。不用说，那辆自行车早已被人家捷手先得了，不过男主人公也没有空手而归，“五口之中竟有三人捡来了大小不一、奇奇怪怪的垃圾”。“至于儿童自行车嘛，只要再等上两三天，说不定同样的东西又会出现了。”男主人公在心里这样盘算着。

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的《立体几何》（《外国文学》第1期）和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的《等待》（《外国文学》第2期）是两篇需要细细品味的短篇小说。《立体几何》故事结构非

常巧妙，是在一个杀人的故事中套入了另一个杀人的故事。然而尽管小说讲述了两桩谋杀案，但在作品里读者却丝毫觉察不到半点谋杀的血腥气。这与小说的叙事方式有关：男主人公“我”不瘟不火地自述其如何全身心地醉心于整理其曾祖父留下的整整四十五卷日记，而对其妻子则感到不胜其烦，打算与她离婚。在整理日记过程中他发现曾祖父在日记中经常提到一个密友 M，但后来 M 却消失了。他细读相关材料，发现日记中提到一个“无表面的平面”理论，根据这个理论，任何物体通过一系列的特殊折叠便可以使它消失。显然，曾祖父就是运用这个理论使他的密友 M 消失的。于是“我”拿来一张纸，严格按照日记上所写的步骤，一步一步地进行折叠，手中的纸不可思议地消失了。接着，“我”假意与妻子示好，却在与妻子做爱时把她“折叠”起来，而后她也不见了，“深蓝色的床单上只剩下她追问的回声”。

小说《等待》的故事很简单：本尼·阿维尼是一个小镇的区议会主席。表面看本尼是一个事业有成、家庭幸福的男人——本人是区议会的领导人，妻子是小学教师，一对双胞胎女儿也都已长大成人。但有一天他在办公室里收到妻子托人捎来的一张便条，上面写着“别担心我”四个字。起先他确实也并不感到担心，但在他回家后发现妻子不在，接着在找遍了妻子有可能去的地方妻子都不在时，他开始担心了。与此同时，他开始回忆和反思他和妻子关系中的问题：在两人相敬如宾的表象下，他们没有真正的对话和沟通，他总是以自己为中心，却从未考虑过妻子的感受，妻子的理想与追求。妻子热爱雕塑，希望开一个雕塑作品展，他不支持；妻子与女儿们在一起谈话，他“从来不知道她们谈论的是什么，也不想去知道”；甚至在妻子愤怒地指责他“既不关心我们也不关心孩子”时，他也只是一笑置之，并不把它当回事。现在妻子的出走，终于揭开了在他们表面幸福、风平浪静的婚姻生活中早就潜在的感情危机。他坐在妻子“两三个小时前曾坐过的纪念公园那条长椅上”等待妻子。

《等待》表面看似乎只是讲述了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凡人琐事，但研究者发现它蕴涵着非常深刻的主题，它生动地揭示出“生活的悲剧都在于对话的缺失”，“夫妻不合、父子冲突、民族争斗、国家分裂都是缺乏交流的结果”。

在“散文”部分，除前面提到的米勒在诺奖授奖典礼上的获奖词外，我还发现了另一位诺奖得主——法国作家加缪的获奖词《写作的光荣》（《外国文艺》第5期）。这篇最初发表于1957年的获奖词是法国文化界配合2010年“加缪年”而第一次予以全文发表的。正如译者袁莉所言：“这虽然是一篇被延迟了半个世纪才发表的文章，今天读来，依然闪耀着不灭的时代精神，透着强大的文字力量。”

当代法国作家端木松的《法国没落了吗？》（《译林》第6期）虽然篇幅很短，却意味深长，虽然谈的是法国的事，却对中国读者同样富于启迪意义。作者举出当前法国学校里学生错字连篇的作文，大声疾呼：“法语一直是我们的家园，难道今天可怜的法语要毁在我们自己的手中吗？”作者进一步强调指出，“成为今天的法国人，首先要为法国而自豪。要为法国自豪，最好是要了解她。如果孩子们在学校里不再学习法国历史、她的伟大和她的语言，那么法国人真的就不会有什么希望。”

葡萄牙著名诗人佩索阿的《受教的斯多葛信徒》（《译林》第4期）是作者的札记、散文片段的汇编，虽不成篇，却文笔隽永，处处有智慧的闪光，发人深省，引人共鸣。

在“诗歌”部分，除前面已经介绍过的李立扬的诗外，我还特别推荐1995年的诺奖得主、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的诗《诗十首》，（《外国文学》第4期）和斯洛文尼亚诗人托马斯·萨拉蒙的诗《诗十三首》，（《外国文学》第5期）。两位诗人的诗作都表现出深厚的文化底蕴、广阔的国际视野、丰富的想象力和娴熟的写作技巧。而对生命的循环、历史的循环和艺术的循环的沉思，正好突显出两位诗人的共性，也一定能赢得中国读者的赞赏。